

侯马盟书：谁的盟誓穿越2000多年？

文/新华社记者 王学涛

去年是侯马盟书发现55周年。山西侯马晋国古都博物馆展出的六件盟书再次吸引公众目光。一件件小小的玉石片上，字迹已漫漶不清，只留下淡淡红色。2000多年前，古人用毛笔在上面写下忠诚与誓言。

老文物工作者张守中忘不了初见盟书时的情景。那是1965年冬，他和陶正刚等人为配合侯马新电厂建设而进行考古发掘工作。12月9日快中午时，陶正刚拿着出土的盟书兴奋地从工地赶回工作站。“我们犹豫要不要生火，不生火怕盟书冻着，生火又怕

盟书化了。就这样，怀着激动又小心谨慎的心情，等待专家来鉴定。”张守中说，“出现古文字就很重要，没想到还那么多。”

听说新发现后，身为侯马考古工作队队长、主持发掘东周晋国遗址的张颌，请假从山西原平赶到侯马，到发掘现场察看，又对出土的首批盟书文字仔细辨认，利用短短7天假期撰写了《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》的简报。之后，郭沫若又撰写了《侯马盟书试探》。两篇文章拉开侯马盟书研究的序幕。

然而，1966年特殊时

期他们不得不暂停整理研究工作，将出土的盟书封存入库。

这一封就到了1973年。

新中国文物事业的开拓者王冶秋到山西考察，向省领导建议开发山西的文物资源，还特别提到侯马盟书，认为不能长期积压，应尽快整理，公布资料，以便学界共同研究。侯马盟书整理小组随之成立，张颌、陶正刚、张守中三人分工合作，分别负责整理研究、写考古报告、临摹。苦战两年多后，终于完成《侯马盟书》的编写任务。

侯马晋国古都博物馆的展板上写道：侯马盟书最大者长32厘米、宽3.8厘米、厚0.9厘米，小型的一般长约18厘米、宽不到2厘米、厚仅0.2厘米。玉石片上的文字为毛笔所写，字迹绝大多数为朱色，少数为黑色。

“盟书字体小如豆粒，不清晰，再加上数量多，不好整理。”张守中曾负责临摹盟书标本，他通过大量书法实践，总结出侯马盟书的书法艺术特色为形体古雅、变化繁多，属大篆体系。“盟书艺术是一片沃土，有待更多有志者去耕

耘开发。”他说。

已故的古文字学家张颌当时受命整理研究侯马盟书。他的儿子张崇宁回忆，由于盟书字迹不清，父亲常在100度灯泡下，借助四倍、六倍、八倍的放大镜看，工作几个小时到院里休息一下，返回来再看，还把研究结果仔细记录下来，取名《盟书燃犀录》。

在他们的努力下，一千余件盟书临摹发表656件。据张颌考证，侯马盟书的主要内容是，主盟人晋国卿大夫赵鞅在索取“卫贡五百家”的事件中，为团结宗族、打击政敌而举行

盟誓活动。这场斗争拉开了三家分晋的序幕。

“虽然主盟人的身份存有争议，但侯马盟书最早的记录还是跟赵鞅有关。”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谢尧亭说。

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建文告诉记者，春秋时期流行“盟誓”，“盟书”也称“载书”，一式两份，一份藏于盟府，一份埋于地下或沉入水中。一些文献资料中谈到盟誓，但没有出土实物，侯马盟书的出土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。

到底是谁的盟誓？答案仍在探寻。

老票证

◎ 鉴赏

老票证曾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，买粮需要粮票、买布需要布票……这些老票证见证了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变，是当之无愧的现代文物。

涉及生活各个方面

粮票、油票、布票、日用品购物券等老票证，是我国在上世纪50至90年代初实行计划经济的产物。那个年代的工厂和机关单位实行实物发放的福利制度，快过年的时候不发年终奖金，而是发食物或者票券，因为大家有钱没票买不了什么好东西。有的单位让大家排队轮流领取自行车票、缝纫机票等，这种“福利”算相当不错了。

当年票证可谓五花八门，涉及民众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。统归起来，大致分八大类：粮食、副食、食油、肉蛋、棉纺织品、日用工业品、日用杂品、生产资料，每一类又有许多种。当时，不管买什么，各拿各的证，各有各的票。其中日用工业品这一类，内容甚为广泛，从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、收音机，再到暖瓶、搪瓷洗脸盆、茶缸、铝锅、饭盒等，凡跟“日用工业”沾边儿的都包括在内。

那个年代，购买日用品的票证在各地叫法不尽相同，如北京、济南、青岛



等地叫“购货券”，上海叫“专用购货券”，太原称“购物券”。由于北京市在上世纪60年代初所印制的购货券上有“日用工业品”字样，故而不仅当地人习惯称其为“工业券”，且流行于他地。尽管称谓不同，但日用品票证上多含有如下内容：城市名称、券的张数（上海券面最大额为“伍张”，北京券面最大额为“叁张”，太原等地多为“壹张券”；之下还有“0.5张”“0.1张”）、发行机关公章、发行年份、衬景构图。此外，北京市另设“农村购货券”，在张数字样下面，均有所辖县的名称，如“房山县”“昌平县”等。凭这些购物券去商店购物，越是名牌商品，要券越多。比如一双尼龙袜子，国产的收0.1张，进口的收0.2张；而天津产“飞鸽”牌或上海产“永久”牌自行车，以及上海产“蝴蝶”或“蜜蜂”牌缝

纫机，则各需100张；至于小件的上海牌手表、上海产“红灯”牌电子管收音机要券亦不菲。

以粮票居多

各类老票证中存世量最大、最有代表性的当属粮票。彼时，凡购买与粮食沾边的东西都要粮票，比如称一斤糕点，至少要收四两面粉票（或一斤糕点票）。

我国发行粮票始于上世纪50年代，其种类之多不胜枚举，诸如全国通用粮票、地方流通粮票、军用粮票、农业粮票、工种补差粮票、菜农粮票、补助粮票、奖售粮票、供给粮票、划拨粮票、流动粮票等。粮票按粮食品种分，又有面票、米票、细粮票、粗粮票、大豆票及副食、熟食、馒头、糕点票等。按使用范围分，上至全国，中有省、市，下到县、区、镇、矿、厂、校。按使用期限分，最长者达27年，短的仅为1个月，且有的分单、双月使用。按面值、面额分，大的百斤、500斤甚至千斤，而小的仅半两（上海、浙江粮票）。各地粮票的票面面积也颇为悬殊：大似两角人民币（重庆），小如邮票（上海）。

粮票图案以祖国各地风光为主，体现出不同地域的特色，诸如延安粮票上的宝塔山、山西粮票上

的大同煤矿、河北粮票上的赵州桥等。也有些地方粮票构图简单，甚至仅为简单的汉字，极易被私印仿制。

粮票进入收藏市场后，很快就成为广受追捧的收藏佳品。据报载，香港普艺公司在2005年8月6日举行的钱币邮票和怀旧收藏拍卖会上，首度参拍的全套“中国粮票”，仅拍卖底价就高达2.4万港元。如1955年版全国通用粮票全套共5枚，面额分别为4两、半斤、1斤、3斤、5斤，市价参考价每套为100元左右。还有1978年和1982年末流通使用的两套全国粮票也备受市场青睐。其中，1978年版全套5枚，面额分别为半斤、1斤、3斤、5斤、10斤，市场参考价每套约300多元；1982年版全国通用粮票全套2枚，面额分别为3斤、5斤，市场参考价每套约150元。

与全国粮票相比，省级粮票在收藏界以品种多、搜集难而著称。尤其是早期省级粮票在藏市更是深受投资者青睐，其价格持续攀升，一些珍贵的稀罕品种更是有价无市，供不应求。在2001年，山西省1955年版30斤面额粮票单价为150元，至2006年，即使出350元也难买到；1966年版山东省5斤面额粮票单价为400元，现在800元甚至上千元也难以觅到，显示出早期精品粮票很好的升值潜力。

（据《西安晚报》）

◎ 收藏

宴饮游戏中的投壶

投壶，即投壶人站在离壶一定距离的地方，把矢投向壶中。它是一种古代宴饮礼仪，又是一种娱乐游戏。最早出现于西周，战国、汉唐时期盛行，宋代以后逐渐衰落，一直延续至清代晚期。



《左传·昭公十二年》载：“晋侯以齐侯宴，中行穆子相，投壶。”在两国诸侯宴饮中举行投壶，投壶在春秋时代已成为一种正规礼仪。东汉郑玄为先秦典籍《礼记·投壶》作注时说：“投壶，射之细也，射为燕射。”。古时燕与宴同义，燕射即饮宴时的射箭活动，表明投壶是由古射礼的燕射演变而来。可有的客人确实不会射箭，就用箭投酒壶代替。久而久之，投壶就代替了射箭，成为宴饮时的一种礼仪和游戏。

投壶，舍弃了箭之武，保存了投之礼。注重从容安息，养志凝神，在士大夫及文士儒生中盛行不衰。每次宴饮，皆“弹瑟曲，行投壶之礼。”随着历史的发展，投壶又从宴饮礼仪逐渐变为上流社会的高雅娱乐游戏，后来在民间广泛流行，民间以投壶为乐的现象越来越普遍。投壶不断发展，不仅产生了许多新名目，还增加了难度，有人别出心裁地在壶外设置屏风盲投或背坐反投。投壶特有的魅力和趣味性，为人们广为接受和喜爱。古代有不少投壶高手，明代有个叫苏乐壶的人，因投壶技术高超，被人称为“投壶绝”。沈榜在《宛署杂记》中记录了苏乐壶的绝技，称他不仅能背身投壶，还能用3枝矢同时向3个壶投射，且从不失手。

古代投壶，有严格的规则。古乐响起，宾主双方分别把矢投向壶中。每投进一矢，由司射给投中者放上一“算”，“算”即用来计算投中数目的用具。投壶依次进行，抢先连投者即便投入司射也不给“算”。大概“不算”一词即由此而来。四矢投完为一局，司射为胜者“立一马”。共进行三局，谁立三马，就算取得最后胜利，负方饮酒罚罪。

投壶有铜投壶和瓷投壶。（据《西安晚报》）